一、**周賢農、吳聲潤的口述史，展現出怎樣的矛盾？**

周賢農的口述史先述說了自己讀禁書的理由是因為要追求更好的成績，本身沒興趣，並表明了自己與關係人「黎子松」在離開學校後就極少來往，且根本不清楚「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是甚麼，然後強調是因為害怕才會直接按照審問者的意思簽字，最後再強調自身16、17歲不可能犯案。

但周賢農後來敘說了自己受到老師言語「鼓勵」，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在離開學校後跟老師也還有適當的聯繫，偵訊時甚至因為內容都是事實，才沒有多做辯解直接簽字畫押，與前述產生十分大的矛盾。

吳聲潤的口述史先述說了他思想較為左傾，有讀過共產黨的書但並沒有深入的了解，然後並沒有特別的激烈行動，始終認為自己並沒有錯。

但吳聲潤後來敘說了自己讀過毛澤東的書，並早加入了共產黨，並認為自己犧牲生命是沒問題的，因此有負責製作手榴彈，為了「解放戰爭」，且認為自己是為了恪守黨員志節，而非認為自己沒錯，與前述也產生了矛盾。

二、**上述的口述史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矛盾？後人該怎樣追求真相？**

出現矛盾可以分為四個部分探討，第一個部分是文化面，因為訪談者常常會從「人權理念」出發設計訪談內容，希望被害者可以「討回清白」，使得被害者可能會需要虛構出對方期待的故事；文化面還因為以往的案件常屬於「純屬思想上的傾向」、已承認體制的情況進行改良，而非走在暴力路線上，加上大眾對共產黨的不理解，致使部分人士只能說自己「思想左傾」；最後，文化面還因為受訪者跟主訪者的認同立場不一樣，怕被對方貼上汙名化標籤、加上怕被以前的「老同學」批評，會不敢講出最真實的話。

第二部分則是制度面，因為大眾對於白色恐怖平反較為缺乏熱情，加上當時大多案件都牽涉「中共地下黨」，因此若希望大眾增加此平反度，則需要考慮「哪種事實」較可被大眾接受，且許多增設的補償機制，補償對象只有「冤屈者」，若有「叛亂實據」則不符合，但因為被關很久，常常會需要這筆補償來改善家族生計，因此得講出一些非事實的話。

第三部分則是社會網絡，因為受訪者出獄後大多對家人們心懷愧疚，因此正確地說出「當年心境」會需要面對親密關係的糾葛；加上當事人對難友外的外人缺乏信任，致使難以獲得正確事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群難友之間的壓力，會使當事人不敢講自己認為的事實。

第四部分則是心靈層次，會思考「後悔」的問題，但卻又跟當初的「無悔」標語相互衝突；再來也是怕被難友說是「動搖份子」，這份後悔的心情，無法跟任何人述說，因此一旦受訪講述事實，這份心情可能會湧上，致使不敢說。

後人有九個實作上的建議。一、主訪者需要持續檢視自我的歷史想像，避免無法解讀受訪者的弦外之音；二、避免讓獨統的想法左右受訪者對訪問題材方向的選定與詮釋，否則易被侷限；三、得區分「倫理」與「事實」的差異，不然會使事實有所偏誤；四、要熟讀史料，否則將無法建構正確的歷史圖像；五、不該認定判決資料皆為「純屬捏造」而不讀，因為大多資料都是實際發生過；六、得將白色恐怖平反設定為冤案進行檢討，因為有些事件是真實存在；七、得掌握受訪者的人際網絡，避免受訪者可能不敢說實話；八、既有的口述史不一定為真，因為有時間還有受訪角度的限制；九、訪談本身包含了很多問題，包含共感、權力，需要克服這些才能逼近真實。

三、**受害者的家屬，為何也是受害者？**

這其中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包含了「親人的消失」，他們的家人在半夜或是上班時突然被帶走，並且再也沒回來，或是變成屍體找不到，在當時環境下也只能自己默默消化；再來是「經濟的困苦」，因為有政治抱負的大多都是男性，他們同時又是一家的經濟支柱，使得當他們被抓走後，必須由在當時身分較為低下的女性承擔起一家的經濟，也相對較為困難；接者還有「政治犯家庭的孤立」，因為受害者的關係，他們時常得忍受他人對自己的指指點點，以及所帶來的心理壓力；以及「監視與噤聲」，因為他們有叛國疑慮，他們也得長期遭受到政府的監控，且他們在痛失家屬後的第一時間只能噤聲，不能多做言語上的反抗，不然可能會招致一樣的下場，在中間常常被外人闖入家中，也對受害者家屬產生了一定的PTSD；還有「家的破裂」，當受害者回到家裡後，其餘家屬必須得重新適應有他們的生活；最後是「受害家屬的主體性」，受害家屬並未得到任何賠償，他們只被視為口述者及轉述者，但過程中所受的痛苦是較少人所重視的。